

【文学】

DOI: 10.15986/j.1008-7192.2016.06.013

乡土叙事中国国民性批判主题的承续与发展

——以贾平凹《阿吉》与鲁迅《阿Q正传》为例

潘靖壬, 韩鲁华

(西安建筑科技大学 文学院, 陕西 西安 710055)

摘要: 在中国现当代文学的叙事中, 以乡土为主题的文学叙事是一条发展主线。贾平凹的乡土叙事是对鲁迅开创的中国现代文学乡土叙事的承续与发展, 通过对《阿吉》与《阿Q正传》的分析, 指出二人在国民性批判上的联系与区别; 并说明贾平凹建构的国民性批判主题为当代乡土叙事的书写提供了独特经验, 即贾平凹是站在宏大时代背景下从人生存本体出发来解析现实生活与文化心理性格, 将国民性的批判融于现代人的入性、人情之中, 并赋予其现实、历史、文化、心理、性格等方面的内涵。

关键词: 乡土叙事; 鲁迅; 贾平凹; 《阿Q正传》; 《阿吉》

中图分类号: I206.6 **文献标志码:** A **文章编号:** 1008-7192(2016)06-0066-06

中国文学叙事的现代性历史转换, 如果以梁启超《论小说与群治之关系》中提出的“小说界革命”为肇端, 至今已有一百一十多年; 如果以胡适发表的《文学改良刍议》作为起始点, 也近乎百年; 如果从充分显示中国文学叙事现代历史转换实绩的角度来考察, 把鲁迅的《狂人日记》作为中国文学现代叙事的新纪元亦可说也将近百年^①。若按学界对此问题的新见解, 认为早在1887年黄遵宪撰著的《日本国志》卷三十三《学术志二》中便提出“更变一文体为适用于今, 通行于俗者乎!”以期达到“言文合一”, 让“农工商妇女幼稚皆能通文字之用”。显然, 这已具有白话新文学的思想; 而陈季同1890年出版的《黄衫客传奇》是“由中国作家写的第一部现代意义上的小说作品”^{[1]7-8,10}。由此可看出, 中国文学叙事之历史转换已有一百二十多年。中国文学叙事的现代性历史转换, 在这百余年或者近百年间, 经过西化吸纳、本土承继的奔突之后, 经历了从自卑到自信的确证, 现在到了历史性归纳总结阶段。也就是说, 中国现代文学叙事发展从“我何生”经过“我是谁”, 再到今天的“我是我”。

从中国文学叙事的现代性历史转换来看, 如果说鲁迅及此后的现代作家是在现代文学创建上将文学现代叙事的可能性变作现实边界性, 那么, 新时期以来的作家则在突破现代文学叙事, 特别是当代文学叙事的边界, 最大限度地创造着文学当代叙事的可能性与极限性。正是在这种文学叙事的可能性与极限性的创造中, 将中国文学的叙事牢牢根植于本土, 并以主动积极的姿态实现着与世界文学叙事的对话。

自2012年莫言获“诺贝尔文学奖”、2014年阎连科获“卡夫卡文学奖”、2015年刘慈欣获“雨果奖”、2016年曹文轩获“国际安徒生奖”后, 中国当代文学的整体叙事已成为世界文学的有机组成部分。自此, 从梁启超、胡适、鲁迅等开启的中国文学现代叙事, 到莫言、贾平凹、阎连科、刘震云、王安忆等一代作家的中国文学当代叙事, 虽然可能还存在着一些未能完全尽如人意的地方, 但从整体上来看, 基本跟上了世界文学前行的步伐。

在现代文学历史转换与建构的历程中, 面向底层社会生活, 特别是将农民作为文学叙事的主角是一个极为重要的叙事特征。在这个意义上可以认

收稿日期: 2016-06-13

基金项目: 国家社科基金西部项目“当代文学新乡土叙事比较研究”(11XZW019)

作者简介: 潘靖壬(1990-), 男, 西安建筑科技大学文学院硕士研究生, 研究方向为现当代文学、中西美学; 韩鲁华(1955-), 男, 西安建筑科技大学文学院教授, 西北大学“贾平凹研究中心”特聘教授, 研究方向为现当代文学与地域文化文学。E-mail: panjingren1990@163.com

为,鲁迅开创的乡土文学叙事构成了现代文学叙事的一条发展的主要线索。在这条文学叙事线索上,可以列出一长串的作家作品,这就构成了中国现当代文学发展历史的一种基本叙事形态。在这一文学叙事之中,其中一个非常突出的征象是:对国民性的批判与反思,并于国民性的批判与反思中试图建构起新的国民性。对国民性的批判与反思,鲁迅不仅具有首创之功,而且所达到的深度直至今天也是使人振聋发聩的,产生了极其深远的历史影响。而贾平凹是承续与发展鲁迅国民性批判的一位极具深厚意味的作家。贾平凹在中国现代文学从“我是谁”到“我是我”的再次转换中,以其数以千万计的、极富艺术探索性的作品,为促进、支撑和完型这一历史进程生成了不可替代的价值和意义。

贾平凹受鲁迅文学叙事传统的影响是极为明显的,不论就其进入文学创作之初,还是进入新世纪的新乡土叙事,贾平凹的文学叙事与鲁迅的文学叙事传统有着密切的关联性。如果把贾平凹自《废都》,尤其是《秦腔》之后,将学界对贾平凹的研究分析后便会发现,评论者的关注点并不在田园牧歌的叙事上,而是对其在当代中国现实与历史以及文化精神的开掘上。贾平凹对中国的历史文化精神以及当代乡土生活与乡土人生的生存状态的把握与开掘上,显示出明显的独特性批判与尖锐性反思的特征。由于社会时代的发展,不仅是贾平凹,就是其他作家如高晓声、莫言、阎连科、刘震云、张炜、王安忆、韩少功等等,就连包括所谓的先锋写作的余华、苏童等一大批当代富有成就的作家,在对鲁迅乡土文学叙事传统进行承继的基础上都有着新的发展。这正如从传统乡土文学叙事转向新乡土叙事一样,对于国民性的批判也就自然地会出现新的思考。

一、乡土叙事中国国民性批判主题的承续

自鲁迅创建国民性批判以来,在中国乡土文学书写中有一批作家对国民性进行了不同程度的批判与改造。在中国当代作家中,贾平凹对鲁迅国民性批判的承续尤为明显,无论是《土门》《废都》还是《秦腔》,或多或少都有国民性批判的因子。

而贾平凹的中篇小说《阿吉》^②与鲁迅的中篇小说《阿Q正传》,从作家的创作观念、人物形象的塑造、国民性批判的程度上都存在极大的相似性。这是贾平凹在乡土叙事建构中对鲁迅的国民性批判呈现出的最为明显的历史承续迹象,正如作家在接受媒体采访中谈到《阿吉》的写作动机一样:

我写《阿吉》肯定受鲁迅的影响,所以人名也用了“阿”字。人性中的劣根如笼中的狮子,贫困常常使笼格腐烂。常言说人富了就温柔,人穷了便使强用狠。

二十年前我写商州的故事,有人指责我是把农民的垢甲搓下来让农民看,我现在仍在搓垢甲,这垢甲已不仅是农民,有城市人,也有知识分子,当然包括我自己。我现在居住于城里,目睹着市政府经年用力?最大的工作是解决交通拥挤而扩张道路,就感叹这都是为富人着想啊,因为富人有小汽车。但想一想,所有的富人都是由穷而富的,一部分先富起来方能带动全部人的富裕。

关心农民,不一定就以农民的眼光看待一切,但在努力使全社会富裕的过程中,许多问题没引起警惕和解决。现在,我们说培育民族精神,提高国民素质,这是全社会的问题,其中要富裕,要教育,也要做人性缺陷的修补工作吧^[2]。

从作家的自述中可以看出,贾平凹的乡土叙事,尤其是《阿吉》的文学叙事明显受到了鲁迅的深刻影响,在相当程度上存在模仿的痕迹。贾平凹在承续鲁迅国民性批判的基础上做了进一步思考:在新的社会时代背景下,做出的是更为切合当时社会时代精神价值的国民性批判。贾平凹“把农民的垢甲搓下来”的叙事与鲁迅的“揭出病苦,引起疗救的注意”^③一脉相承。且不论贾平凹乡土文学叙事中对鲁迅有多少新的拓展,就刺痛国人的魂灵而言,也是具有其价值意义与独特贡献的。

阿吉于文化精神上是“阿Q”在过去将近一个世纪后21世纪初的复活。在阿吉的身上,依然存有“阿Q”式的恃强凌弱、自欺欺人的带有虚无英雄主义色彩的幻想性格,是一种扭曲了的、不健全的心理“变态”。作品中有一段叙述极为典型:“阿

米是村里的上门女婿,阿吉没进城前就眼里没有他。婚后的第二天,牡丹引着新夫阿米来给本家子各户认门磕头。到了阿吉家,阿吉问:‘贵姓?’阿米说:‘免贵,姓米。’阿吉就笑了。阿米说:‘大哥的大名?’阿吉说:‘说了嫌你怕怕哩!’阿米说:‘莫非大哥叫老虎?’阿吉说:‘老虎倒不是,叫鸡,往后你不要惹了我!’从此阿米果然害怕阿吉^{[3]423}。阿米何以怕鸡呢?因为阿吉是一只好斗的公鸡。阿吉这种恃强凌弱、欺软怕硬的心理性格与“阿Q”又有什么不同呢?他们都是一自欺欺人的心理性格,以期取得一种精神上的自我安慰,这是否是一种狂妄自大的带有病态心理具有虚无英雄主义色彩的妄歌呢?基于此,可以做出这样一个基本判断:与其说是贾平凹受鲁迅对国民性深刻揭示的批判影响,不如说是“阿Q”式的国民性依然存在。

不仅如此,阿吉身上的“奴性”意识比“阿Q”并无多少改变。阿吉在阿米、小安面前耀武扬威,甚至在有的人面前使狠耍横,对于已经改变了或者正在改变着生存境遇的人极尽嫉妒之能事。但在领导面前、在城里人面前却是一副奴才相。在乡政府见到县上领导,看到“领导原来是个白胖子,这让阿吉和阿米肃然起敬”^{[3]441}。这是领导的威势所致,亦是中国几千年农民,乃至所有的平民百姓怕官惧官而形成的“奴性”心理的表现。更耐人寻味的是作品结尾的叙事:“阿吉在火车站东边的席棚里,他对来收管理费的人说他名字叫鸡,左边一个又,右边一个鸟的鸡。”^{[4]34}在城里人与城市管理者面前,阿吉一下子又被打回了原形。“阿Q”不仅在赵太爷面前抬不起头,就是在假洋鬼子的哭丧棍下也是一败涂地,尤其是见了县太爷就身不由己地下跪。因此,阿吉与“阿Q”在当官者面前具有软骨病与胆小退缩的萎缩病,甚至可以谴责他们这种缺乏主体性、平等观念、自我意识的“奴性”生存状态。但是需要追问的是:阿吉与他的祖师爷“阿Q”为何会如此呢?为何都过去了将近一个世纪,阿吉式的农民百姓见了当官的还是如此呢?我们身上难道就彻底根除了阿吉式的精神软骨病吗?

二、国民性批判的“裂变”

《阿Q正传》对国民性的批判主要是通过“阿Q”这一艺术形象的典型塑造而完成的。有关“阿

Q”这一典型艺术形象及其鲁迅对“国民性”批判的研究已经很多,故不再赘述。在此主要解析贾平凹笔下阿吉这一艺术形象体现了怎样的国民文化心态与性格,进而析理阿吉与“阿Q”在文化精神上的内在关联性与发展嬗变性。

阿吉是一个生活在中国社会转型时期无父无母的青年农民。作家不去叙述他的父母祖上,显然是一种有意而为的叙事策略:无父无母,自然失去了人类情感关系中最重要亲情,缺少了一份人生最为重要的由血缘亲情这一纽带所带来的温暖。但他似乎比“阿Q”的“出身”要好一些,有一个名叫阿狗的兄长。从作品极为简略的叙述可知,兄长阿狗虽然对他还算有一份亲情与关怀,父母刚过世,兄长“发誓说他卖豆腐也要供弟弟念完高中念大学。可是阿狗一娶了婆姨就听婆姨话了,分家另过,搬到小站卖豆腐了。”^{[4]2}从此阿吉便与兄长嫂子断绝了来往。从亲情角度来看,阿吉的生命存在实际上是一种处于无家人关照或者约束的自由自主状态,走上了人生的孤运——孤立独行、无依无靠的人生道路,亦在暗示阿吉“背运”的初始原因。他似乎成为一个“游魂”,处于一种自我“放逐”的人生状态。正因为如此,他的心理性格就会与常人不同,常常以一种“非正常人”的方式去走自己的人生道路。不论是离乡进城,还是离城回乡,或者说是最终再一次离乡进城,可以说都是无所牵挂的。这样的人一般是不安顺的,具有一种极强的破坏性。

可见,阿吉与“阿Q”的不同之处在于:阿吉的离乡进城—告城返乡—再次进城等行为因其具有一定的文化修养虽也是生存环境所迫,但在行动的决定上还带有一定的自主性;而“阿Q”是一种非自觉状态。阿吉是在社会历史转型中寻求一条自我解救的路径;而“阿Q”则是纯粹的自然生存方式的适应,就连他的革命也是一种盲从。阿吉属于不安顺的一类人物,天不怕地不怕,正如作品所述:“我是咬哩,可我有原则,以势欺人的我咬,村盖子我咬,别人不敢咬的我咬,别人咬不动的我咬,你说不能咬的我偏咬”^{[4]26}。在新的历史境遇下,贾平凹对阿吉的叙事较之“阿Q”,具有一定的历史进步性:“阿Q”似乎并没有考虑过自己要

掌握自己的命运,因而在历史转型的情境下,也就成为中国社会历史转型中的一只懵懂的苍蝇。

贾平凹对阿吉改名的叙事亦是具有意味的,呈现出在世纪之交的大背景下所表现出的独特的历史转型性。“阿吉原名叫阿鸡,从城里打工回来后村人才知道他已经改名了。城里人将妓女称做鸡,这使初次进城的阿鸡很没体面。虽掏了五元钱在环南十字路口的卦摊上求了个‘吉’字,但字改音未改,仍被人瞧不起。”^{[3]422}由“阿鸡”到“阿吉”体现出截然不同的人生愿景。阿鸡改名为阿吉后得到了村民的尊重,这尊重背后隐藏的是阿吉进城后发财了,改变了身份。当人们发现阿吉并未发财时,对他的态度在相当程度上又恢复了以往。这一点与“阿Q”从城里回来受到人们的尊重没有二致。在这里,我们更关注的是阿吉改名的隐喻意义。与其说是为了改名,不如说是为了改变自己的社会生存境遇,当然其间也包含了一种自我心理精神上的满足,虽然这种满足带有极大的虚妄性。与“阿Q”相比,这自然有着某种相通性,同时又存在着差异。

“阿Q”究竟叫什么,不得而知,更为重要的是他不许姓赵,是对其社会生存名分的一种剥夺。

“阿Q”从未想过要改名,只是回归自己的真实姓名而已。阿吉并没有人剥夺他的姓名,而是他自己主动改名。背后的隐喻意义是“阿Q”没有生存的名分,而阿吉虽然具有生存的名分,但由于太过低贱因此试图改变自己生存的社会名分。于此,是否还具有更为深广的叙事意味呢?乡下人社会身份的认同首要的是需得到城市的认同,改变身份也是改变自己乡下人的文化身份,城市及其文化成为一种参照。改名但实际生存境况并非发生本质的变化,也就是其社会身份并无变化。这中间有着自我满足、自欺欺人的意味。这些心理精神特征,具有极大的社会与文化的概括性,也是至今依然存在的一种国民性性格。

阿吉正如贾平凹所言:“他是小人,又是有才的,而且太能活,很多卑劣的事情都以神圣的面目出现了。”^{[5]153}在两家争夺水渠工程的修建中,阿吉凭借自身的计谋与“才干”赚到了一千一百元。不仅如此,阿吉还凭借自己的智慧或者狡诈,让阿米与小安见了得胜不停地说:“叔,你咋啦,脸色

这不好!”“你也买些好东西吃,瞧瘦成啥了!”^{[4]17}明明是在造谣生事,无中生有,虽是因嫉妒而生的龌龊之心的作祟,但却是以似乎很正派的关心别人的面目出现。阿吉的这种心理心态具有其现实的生活基础,所反映出的一种忌富的心理亦具有历史文化渊源,这是在中国历史文化温床上生长出来的“恶之花”,不也是国民劣根性之一种吗?但是比较来看,阿吉应当说比“阿Q”更加机警、智慧。

阿吉身处的社会环境不是革命时代,而是改革时代。革命是一种以完全剧烈的对抗方式来重构社会结构的意识形态,而改革则是一种以比较温和的方式在并不改变社会基本结构的基础上进行嬗变、调整的社会形态。但这并不意味着阿吉就没有以革命的方式来改变自己社会地位的想法。在阿吉因编排乡领导而被乡长训斥,从此失去在龟兹班的营生之后,在“自己家里骂乡长,骂阿财,骂栓子和团圆”之后,竟然骂了一句“文化大革命,我×你妈!”当阿米说他骂错了:“文化大革命惹你了?咱那时还穿开裆裤哩。”阿吉说:“我骂它怎么就不再来啦?!”^{[4]33}“阿Q”处于辛亥革命时期,他是被迫卷入这场革命的,而且是糊里糊涂地被杀掉了。而阿吉就是连“文化大革命”这样的历史事件也错过了,所面对的是社会的改革而不是革命。也正因为是改革,阿吉似乎无了用武之地。但是,如若遇到辛亥革命或者“文化大革命”这样的革命时代,阿吉的命运结局又当如何呢?无非是“阿Q”或者霸槽^①式的下场结局。由此可以看到,一方面改革限定了阿吉革命的心理;另一方面也在说明阿吉式的具有革命意识的人依然存在,或者说于社会历史转型时期社会中依然潜伏着革命的因子。也正因为这次社会历史转型是一次改革,故此阿吉在再次失去生存条件(被赶出了龟兹班)之后并没有像“阿Q”或者霸槽被杀头,而是再次去了城市。

三、贾平凹对“国民性”批判的贡献

阿吉与“阿Q”既有相通之处又有变异之处,这种相通与变异主要表现为贾平凹与鲁迅所处的社会时代背景不同,使得作家对人生、命运、时代、社会思考的侧重点不同。因此,有论者指出鲁迅“笔

下寂寞的乡间,诗意的存在寥寥,破败与灰色把人的世界罩住,一切如旧,民心几乎没有什么变化。阿Q的命运表面与辛亥时代的氛围有关,细看起来确是历史惯性的延续,那一切不过是游民存在的新式形态,只是罩上新的革命时代的词语罢了。”^{[6]286-289}从这个层面而言,贾平凹的国民性批判相较鲁迅有了进一步的发展变化:贾平凹用更为丰润的笔触叙写出了生活在这个时代下小人物的“病态”命运与生生不息的“呐喊”,这是一种积极向上的奋斗、拼搏的力量。

整体来看,在人物形象的刻画上,两位作家走的路子也是同中有异。相同或者相似之处在于“阿Q”的“从中兴到末路”与阿吉的“告城返乡——再次进城”不是单线索的叙事,而是把主人公置于多层次、多侧面、多角度的“小故事”中交叉进行的。正如“阿Q”的故事可以从多种角度进行解读一样,阿吉的所作所为、种种行迹亦是蕴含有大山一样的丰富性。但对于这一人物形象的树立,二者之间有明显的差异:鲁迅是以反讽的杂文风格加以主观意图进行刻画;而贾平凹则是更多的让主人公自己对话、自己表演,以一种脱离在场叙事的旁观者身份进行描述。在艺术特色上,二者的共同之处都是悲喜剧夹杂,但都以悲剧而结局。“阿Q”凸显的喜剧因素是作者直接、干练、精当的反讽叙事手法,甚至表现出极为明显的滑稽剧的特质;阿吉凸显出来的喜剧因素则是作家赋予主人公更多的主体性与独立意识的带有自我表演性质的隐性叙事手法。贾平凹的叙事就犹如海绵中藏着针刺,看起来柔和而内里却暗藏杀机。

贾平凹曾说:“鲁迅好,好在有《阿Q正传》,是分析了人性的弱点,当代的先锋派作家受到尊重,是他们的努力有着重大的意义。《阿Q正传》却是完全的中国的味道。二十多年前就读《阿Q正传》,到了现在才有了理解,我是多么的蠢笨,如果在分析人性中弥漫中国传统中天人合一的浑然之气,意气风发,那是我新的兴趣所在。”^{[7]194}

从这段贾平凹的自白中,就可看出贾平凹对鲁迅的国民性批判是裂变式的继承,这正是贾平凹的贡献之处。

四、结 语

《阿吉》与《阿Q正传》是两个时代中文学创作的一种遥相呼应,这种创作意图上的切合与关联所蕴藉的意义,就是论者论述的结点——国民劣根性在不同时代的不同表达,或者说是现代文学自救方式在不同时代的不同表达,而这种现代文学的自救方式即是文学自治思潮。所谓文学自治思潮是“以现代知识体系、现代学科分类原则为基础,与美学学科的确立、审美独立意识的产生以及狭义‘文学’概念的出现相生相随而兴起的一种文艺思潮,是文学观念从古典形态变为现代型的一项标志性内容。它突出文学的本位意识和审美特征,视自身艺术规范的建设和发展为文学活动的中心和正格,相对排斥文学与外部世界的关联,但它追求自由、坚守独立、张扬个性的审美精神仍然维系着文学的文化维度和人生关怀。”^{[8]2}

鲁迅对国民性的批判武器是文化启蒙思想,基本是以西方现代文化思想作为参照标准,站在知识分子文化思想启蒙的立场上将温情隐藏起来,用解剖刀毫不留情地挖出病痛,决绝而犀利。贾平凹对国民性的批判除了关注社会现实,具有历史文化视野之外,特别强调从“人”出发来解析现实与人们的文化心理性格,致力于开掘融会于人性、人情之中的现实、历史、文化、心理、性格等的内涵。这与五四时期鲁迅一代知识分子的文化启蒙思想存在着相当大的差异。鲁迅在叙事上表现出强烈的思想统摄性,以强大而深刻的思想统括总领其文学叙事,犹如石砌的墙壁坚硬而厚实,虽然经历了近百年的磨砺依然具有强大的艺术生命力。贾平凹的叙事更为自然、丰腴、充盈,于细实而空灵的生活细节叙事中不留痕迹地熔铸了他的思想思考,因而更具艺术的情致与韵味;尤其是对中国古典文学艺术思维与文化精神的融会贯通,使得他的乡土叙事更具有古典诗意境与情怀。借用王德威先生的话说,就是更具抒情性。

参 考 文 献

- [1] 严家炎. 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史:上册[M]. 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10.
- [2] 裴钰,王童. 贾平凹:五十岁想从头再来[N]. 北京娱乐信

报,2002-12-31(4).

[3] 贾平凹. 王满堂[M]. 南京:译林出版社,2012.

[4] 贾平凹. 听来的故事[M]. 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2.

[5] 贾平凹. 五十大话[M]. 武汉:长江文艺出版社,2003.

[6] 李伯钧. 贾平凹研究[M]. 西安: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有限公司,2014.

[7] 贾平凹. 病相报告[M]. 南京:译林出版社,2012.

[8] 马睿. 未完成的审美乌托邦——现代中国文学自治思潮研究(1904-1949)[M]. 成都:巴蜀书社,2006.

Inheriting and Developing the Theme of National Trait Criticism in Local Narrations

—— Jia Ping-wa's *Ah Ji* and Lu Xun's *The True Story of Ah Q*

PAN Jing-ren, HAN Lu-hua

(School of Language, Literature, and Law, Xi'an Univ. of Arch. & Tech., Xi'an 710055, China)

Abstract: The literature narration with native theme is a principle line developing in modern and contemporary Chinese literary narrative. In Jia Ping-wa's *Ah Ji* there is an obvious inheritance and development of the local color narrative of Chinese modern literature initiated by Lu Xun in *The True Story of Ah Q*. The paper analyzes these two works and reveals the similarity and difference between two writers' themes of national trait criticism. It is concluded that Jia Ping-wa's theme provides unique experience for the contemporary local color narrative writing, for standing in the grand background he explores the social reality and the cultural psychology from the viewpoint of human existential ontology. In addition, his national trait criticism is combined with human nature and human feelings of modern era and has the connotations of reality, history, culture, psychology, character and so on.

Key words: local color narrative; Lu Xun; Jia Ping-wa; *The True Story of Ah Q*; *Ah Ji*

【编辑 王思齐】

注释:

① 梁启超的《论小说与群治之关系》作于光绪二十八年,即1902年,后收入《饮冰库合集》(第二册);胡适的《文学改良论议》发表于1917年1月的《新青年》(第2卷第5号);鲁迅的《狂人日记》发表于1918年5月的《新青年》(第4卷第5号),后收入短篇小说集《呐喊》。

② 贾平凹的中篇小说《阿吉》最初发表于2001年7月的《人民文学》,后被2001年第5期的《中篇小说选刊》、2001年第9期的《小说月报》转载,收录于贾平凹《听来的故事》(人民文学出版社2002年10月版)、《阿尔萨斯》(江苏人民出版社2003年1月版)、《王满堂》(译林出版社2012年9月版)等多部中短篇小说集中。

③ 鲁迅在《我怎么做起小说来》中指出:“说到‘为什么’做小说罢,我仍抱着十多年前的‘启蒙主义’,以为必须是‘为人生’,而且要改良这人生。……所以我的取材,多采自病态社会的不幸的人们中,意思是在揭出病苦,引起疗救的注意。”(后收录鲁迅《南腔北调集》,上海同文书局,1932年2月版。)

④ 霸槽是贾平凹长篇小说《古炉》中的主要人物。